

传统、现代和 后现代的纠葛

——新世纪中国电影的文化症结

杨 晨◎著



南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Press


■ 云南艺术学院“戏剧与影视学”博士培育点资助出版

传统、现代和 后现代的纠葛

——新世纪中国电影的文化症结

杨晨◎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的纠葛：新世纪中国电影的文化症结 / 杨晨著.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5482-1977-4

I. ①传… II. ①杨… III. ①电影文化—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J9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3949号

策划编辑：柴伟

责任编辑：李红

装帧设计：刘雨



传统、现代和 后现代的纠葛

——新世纪中国电影的文化症结

杨晨◎著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装：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6.5

字数：285千

版次：2014年6月第1版

印次：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482-1977-4

定价：42.00元

社址：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编：650091

电话：(0871) 65033244 65031070

E-mail: market@ynup.com



作者简介·杨晨

杨晨，1996年四川大学毕业，曾先后从事过管理、报纸编辑、广告策划和企业形象宣传等工作。后进入大学继续深造，2006年获四川师范大学文学学士学位，2009年获四川师范大学美学硕士学位，2012年获厦门大学文艺学博士学位，现担任云南艺术学院戏剧学院教师。目前主要从事影视文学、新闻传播的教学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学、电影、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文化研究。曾先后曾赴京、赴台参加多个国内、国际学术交流会议和活动，并在《世界电影》《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当代电影》《电影艺术》和《艺术评论》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十余篇。

序

朱水涌

在我的博士生中，杨晨是以爱读书、爱思考、爱讨论为他的师兄弟、姐妹所喜爱的，他可以整天泡在厦大图书馆里，沉潜在那浩渺无际的人文社科海洋中，攫微籍厚，一旦有了发现或触动，便会跑到我这里，兴致勃勃地谈论起那些人们叫它为学术的问题。这时候的杨晨，便一改他平时的斯文与腼腆而显得尤为活跃，语言流畅、生动起来，连我的妻子都会说：“杨晨谈学术很兴奋。”

杨晨长得清秀，虽是四川的男性却有点川妹子的美貌，他比他的同门要年长几岁，但与师弟师妹一起读书讨论或游玩时，并看不出之间的年龄差异。在读研究生之前，他已经有了十年以上的工作经历，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和一份不错的薪金，但他不乐意、不情愿在人际与社会沟通中费脑筋花心思。他对我说：“我不适应这交际、焦虑的社会，我希望自己能有一种比较纯粹的生活，喜欢做学问。”尽管我知道如今这世界很难有很纯粹的东西，但我还是很欣赏他的人生态度与学术梦想。在他报考我的博士时，我仔细地阅读了他的文艺学硕士论文，那是一篇梳理与探讨中国古代文论的某些概念及其关联的研究文章，从那些细微的辨析与富于思辨的关联逻辑中，我意识到这是一位能够沉潜到第一手资料中游历又能跳脱出现场而进入一个更开阔的理论场域的学生，我喜欢这种积累扎实而思路开阔的人。博士入学面试那天，导师组的其他老师听他答辩后对我说：“老朱，你今年有好学生了。”这些年来，报考攻读博士的研究生并不少，考生的知识背景、理论视野和整体素质也都不差，但你在他们那些洋溢着才华、放飞着理论想象的文字与话语中，总觉得缺少了什么，总担心他们的学术之路不会走得很远，但杨晨却显得沉稳，让你感到有沉潜的耐心与能力，也不知这是不是他的年龄比别人多了几岁的缘故。

进入厦大时，厦大文艺学学科带头人杨春时教授正在努力建构他的文学的现代

性理论架构，提出了他的主体间性理论，我却一直关注着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更要求我的学生努力回到历史现场，用当代新的理论视野去审视我们曾经发生、发展和正在滋生的文学、文化问题。课堂上，我给学生谈论了现代性境遇中中国现实的文化“症结”，讨论了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文化纠葛。就当下的文学文化问题，我向我的学生表明，在时代的中心与边缘之间，在时代急剧转移的当口，有一道尚待弥合的时代裂缝，这是由于中国未完成的前期现代性与快速发展的后期城市化现代性冲撞的产物，是现实历史进程遭遇到全球性的现代性文化反思的结果。我说，这条裂缝累积着种种现实的延伸与变异，蕴藏着丰富的难于辨析的时代信息和现实症结，当下不少作家的文学选择，正是在追逐现代性而失落、又置身于后现代生产法则之下的一种选择。学生不可能是导师的再版，却不可能不受导师的影响，或许正是这种影响，当确立博士论文选题时，杨晨选择了研究富于现代意味的电影，而且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电影尤其是商业电影，他将他的论题定为《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的纠葛——论新世纪中国电影的文化症结》，我知道他是一名资深的影迷，当他从文艺青年转变成一位美学研究生的时候，他就在关注着中国电影的变动，对电影作品、人物、文化现象和电影理论的关注与研究一直伴随着他的学习生活，攻读博士时，更是力图从学理上去考察和分析电影，也发表了多篇电影评论文章，是有一定学术积累的，于是我二话没说就同意了他的选择。

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的转型以及从谷底而起的反弹是引人注目的，2003年中国的电影总票房估计只有不到8亿元，而到2013年结束时，全国的电影总票房已经超过了217亿元，这种爆发式的增长实属电影史上罕见。然而，这种繁荣却伴随着诸多的负面批评，特别是围绕着中国式大片、中国电影产业格局和中国电影市场的批评声，一直不绝于耳，有的甚至相当激烈。如何看待这样的悖论，如何在今天解决电影生产所体现出来的现代工业产品与综合艺术样式的内在关系问题，是需要一种文化自觉与学术自觉的，杨晨正是带着自己所说的“电影的理论自觉”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选题确定之后，我曾带着他与他的两位师妹到台湾政治大学参加一个“中国现代文学青年学者高峰论坛”。在台湾，他就拼命地钻图书馆、逛书店，他买了很多书，都是电影研究的书籍，他很兴奋地告诉我，他有了很大的收获。之后，我又推荐他参加了由《文艺研究》和首都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首届全国文艺学与美学

青年学者论坛”。无论在台湾还是在北京，他在会上交流的都是自己博士论文选题中的议题，是自己关于中国大片的文化思考。两次会议给了他不少的启发，他也在讨论中收集到了一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更有了一种学术的自信和更开阔的学术视野。

他的论文完成得较早，也写得较顺利，初稿交上来之后，除了在文化研究的梳理与分析中我提出较大的修改意见外，我对他自己的思考、观点、论述与表述并没有太多的异议。论文送审与答辩时，无论是通讯评委还是答辩委员，对他论文的理论触角、问题意识以及对复杂问题的整体审视与条分缕析的学理分析，都比较赞赏。

如今，他的论文就要出版了，这对于导师来说是一种欣慰。我一直有一种想法：一个大学老师最伟大的作品不是他的那些著作，而是他的那些不断成长发展的学生。对于杨晨的论著，我没有多余的话，相信有兴趣的读者自然会从书中看到一个年轻人的发现、他对当下中国电影的系统考察与对现实文化问题的精彩分析，感受到一个执着于理论研究的年轻学者的学养与智慧。如果还有什么需要说明的，那就是他考察问题和研究问题的思路与方式。

杨晨采用的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丰厚的文化整体批评范式，他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中汲取灵感，找到了自己学术架构的理论支撑。他认为当下的中国电影正处在多种权力和话语的异质、冲突、互涉、纠葛的“场域”中，没有单纯的个体，没有单一的文化霸权。中国电影既不简单地存在于意识形态所主导的电影管控中，又不单纯是导演个人的艺术表达、观众审美的对象或娱乐消遣的方式，也不是电影产业化所诉求的以商业为中心的产品。为此，他提出电影的四个基本场域：管控场域、创制场域、传播场域和接受场域，认为这些电影“场域”是一个不断建构的网络，它们以各自的权力和力量依托于不同的文化背景而相互冲突、纠结，从而对当代电影的创作与生产发生交错性的作用与影响，中国电影的生存境遇、艺术演变就在这个网络的各种力量的复杂性和场域间错综变动的关系中展开。在此基础上，他以现代性的理论视角，结合中国当下的文化境遇，在传统与现代、后现代的文化纠葛中，对电影的不同场域和场域间的现象进行阐释与分析，用实证与思辨相辅相成的手法，拨开当代中国电影纷繁复杂的表层，探究了一些中国电影的深层问题，对解决新世纪中国电影的文化症结，做了一个具有创新意识的探究。

杨晨到大学任教已经两年了，这两年中，像大多数刚入职的大学老师一样，他有过角色转换时的“呐喊”般热情，有过现实与梦想不和谐的彷徨，但在学术的领地里，他总是默默地、朝花夕拾般地收获着，在他的这部学术处女作要诞生时，我已经从他的电话与邮件的言语中，发现他已经有了更沉稳的学术姿态了，这再一次让我感到欣慰。

2014年3月28日于厦门大学海滨

目 录

导 论 | 1

第一章 电影场域及传统、现代和后现代文化 | 9

一、文化研究概述 | 11

(一) 文化研究的对象 | 11

(二) 文化研究的方式 | 13

(三) 文化场域 | 16

二、文化研究中的电影及电影的文化场域 | 19

(一) 文化研究中的电影 | 19

(二) 电影场域的划分 | 23

(三) 电影各场域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 29

三、传统、现代和后现代文化 | 36

(一) 传统文化 | 37

(二) 现代文化 | 41

(三) 后现代文化 | 46

(四) 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相互纠葛的当代中国文化 | 49

第二章 电影的管控场域 | 51

一、传统一体化政治文化主导的电影审查体制 | 52

(一) 纠葛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电影审查历史 | 55

(二) 现代化的美国电影审查体制 | 57

(三) 具传统一体化特性的中国电影审查体制 | 59

二、现代性为主导的电影产业化政策 | 90

(一) 现代化的电影产业促进政策 | 91

(二) 意识形态的主导 | 100

第三章 电影的创制场域 | 103

一、被现代商业性主导的电影类别 | 105

(一) 主旋律电影的商业化 | 105

(二) 商业电影中异质文化的纠葛 | 122

(三) 艺术片的商业化趋向 | 133

二、电影企业的产业化进程 | 142

(一) 从现代向后现代转型的电影工业 | 144

(二) 现代化电影企业集团的形成 | 146

(三) 后现代传媒集团雏形的形成 | 149

(四) 现代化和后现代化同步叠加带来的问题 | 152

三、游走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电影投融资行为 | 164

(一) 资本与文化的合流 | 164

(二) 行业内投资及企业并购 | 166

(三) 行业外投资 | 168

(四) 上市融资 | 170

(五) 复杂的电影资本 | 172

第四章 电影的传播场域 | 177

一、从现代到后现代的电影传播格局 | 178

二、电影发行格局的现代化 | 181

(一) 一体化的电影发行体制 | 181

(二) 政策助推发行体制的现代化改革 182	
(三) 现代化电影发行公司的发展 184	
三、现代化的影院和院线制 186	
(一) 中外影院从现代到后现代的演变 186	
(二) 中国现代院线制的形成、发展 191	
四、发展羸弱的后现代电影传播格局 194	
五、传统、现代和后现代叠加的电影传播场域 198	
(一) 传统政治文化借政策和资本合力的渗透 198	
(二) 传统与现代并置、冲突的电影传播格局 202	
(三) 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同步渗透的电影营销手段 206	
第五章 电影的接受场域 211	
一、从现代到后现代的电影批评 212	
二、专业性的电影研究 218	
(一) 被传统一体化文化所支配的现代电影产业研究 219	
(二) 附骥于传统一体化文化的主流电影研究 222	
(三) 借力后现代理论资源的电影软实力研究 224	
三、消费型的电影接受效应 230	
(一) 感性同质化的网络批评 233	
(二) 话语暴力背后的文化症结 234	
结 语 238	
参考文献 241	
后 记 252	

导 论

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在“9·11”事件和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政治和经济以巨大冲击的情况下，国外有的媒体哀叹新世纪初的这第一个十年充满灾难和危机且让人无可奈何^①，但是，对于新世纪的中国电影而言，却并非如此。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持续的滑坡和新世纪初的生存困境后，以国产大片《英雄》（2002年）的上映和2003年国家出台的一系列电影产业化政策为契机，中国电影无论从创制，还是从政策层面来看，都进入了全面商业化、产业化的时代。与此相应，中国电影市场也进入了繁荣的阶段，全国票房从2003年约8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170.73亿元。国产影片的数量也从2001年的88部增加到2012年的893部。全国影院数量和银幕数也进入了建设的高潮期和急剧增长期，影院数量从2002年的1019座增长到2011年的2800多座，银幕数量从2002年的1834块增长到2012

^① 美国《时代》周刊（2009年11月30日）认为：“如果给21世纪的头一个10年加一个标签，那就是灾难：从‘9·11’开始，以一场巨大的经济衰退结束。”[转引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45期（2009年12月7日）] 德国《明镜》周刊认为：“21世纪的头10年充满大危机：极端伊斯兰武装分子袭击纽约，金融系统濒临崩溃，气候危机造成灾难多发，民主制度失去声望，所有这些都构成了西方的失败。”[转引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48期（2009年12月28日）] 美国《纽约客》（2010年1月4日）杂志认为：“至今我们只有‘21世纪第一个十年’这样一个不漂亮且冗长的叫法。现在人们勉强同意称之为00年代，也许这挺合适，因为这十年没什么好结果。”“没能为这十年找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称呼表明，我们觉得这十年不应该是现在的样子。它充满无法化解的冲突和危机、惊人的成就和灾难性的失败，它依然是没有名字、无人认领、令人无可奈何的十年。”[转引自《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1期（2010年1月4日）]

年的 13118 块。^① 从商业角度来看，中国电影的繁荣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是，繁荣的局面伴随诸多问题。

从电影管控方面来看，在国家提出全面建设和推进文化产业化的语境中，尽管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电影产业化的政策，并且开始逐步放宽对电影的管制，但这些政策主要是从提升中国电影商业化、产业化的角度来施行的。就电影作为文化产品来说，与其他类型的文化产品相比较而言，中国电影目前依然是受管制最多的门类。中国电影的从业人员对中国电影的管制政策依然有颇多微词，有关电影审查和分级的争议性事件层出不穷，一直以来呼声极高的电影分级制也未见丝毫踪迹。从现实来看，中国电影的全面繁荣与中国电影政策和体制的全面改革息息相关，政策的放宽、促进和体制的转化、完善，对中国电影的繁荣有直接的推动作用。无论是整个文化的产业化，还是隶属其中的电影产业化，都一直处在意识形态与自由、公平的产业规范化措施相互博弈的状态中。

从电影创制方面来看，从 20 世纪末开始，中国电影开始了商业化的转型，并在新世纪开始了产业化的进程。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电影生产的产业化建设；二是电影商业化的泛化和深化。但是，中国企业在产业化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管理不善和效益不够明显的问题，而电影创作对电影作为商业艺术定位的把握，依然处在探索阶段，尚不成熟。其中，中式大片的崛起在对中国电影市场和产业的发展起到无可置疑的推动作用的同时，“高票房，低口碑”的悖论却是困扰中国电影的突出问题。这些创作上的问题不仅是电影创制环节本身的问题，也反映了当代中国整体文化的现状。

就电影传播领域来看，电影商业成绩提升的主要原因还是电影发行、放映制度改革所促成的院线及银幕数量的增长所带来的市场增量的必然结果。其中发行行业垄断格局的延续、大中城市电影市场的单边繁荣、主流商业院线的急速建设和扩张是电影市场单向繁荣的主要因素。与之相伴而生的问题却是：电影发行放映行业由于市场准入的不平等所造成的竞争不平等；广大中小城市和农村电影市场依然处在

^① 《2013 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新闻通气会通稿》，《当代电影》2013 年第 3 期，第 26 页。本书涉及新世纪中国电影各项统计数据，除特别说明外，均来自新世纪刊载，有中国电影年度总结报告的《当代电影》《电影艺术》《电影》以及中国电影网等电影业界的权威期刊和商业数据发布平台，并通过相互参证，确定一致后得出。

生存危机当中，有的农村、区县市场基本处在电影市场萎靡不振的状态；商业影院的建设和银幕数量的扩张，依然不能满足持续增长的电影产量和观众多元化的观影需要。针对这些问题，尽管国家已经有限度地开放了电影发行权，但是，受意识形态的制约和集团利益的驱使，垄断格局依然存在。尽管国家出合并实施了农村电影的惠民工程，并大力推进新农村数字电影建设，但是由于体制改革中存在不顾各地区实际情况而采取的“一刀切”的改制方式和改制中存在的利益博弈情况，导致部分区县和农村电影市场的萎靡和相关政策难以落实，阻碍了区县和农村电影市场的复苏和繁荣。同时，面临世界多窗口电影发行模式的大电影产业格局，中国电影在这方面明显缺乏竞争力，电影票房的增长过度依赖国内市场，海外市场、多窗口电影的发行和后产品的开发实际上并不成功。

从电影批评活动来看，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全面复苏时期批评与创作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景象不同的是，新世纪中国电影在商业上虽然实现了从谷低而起的爆发式增长，但电影批评的衰落和畸变却备受诟病。本体性的电影理论研究让位给了电影的市场研究，原来在媒体上相对严肃和公平的电影批评让位给了新闻和报道杂糅的商业化的炒作，在电影批评的大本营由传统纸质媒体移师网络后，网络影评的喧哗却难掩其感性同质化的现象和愈演愈烈的话语暴力问题。

当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已经越出单纯的电影研究领域时，如何从更深层的文化语境中去理解这些现象，无疑成为摆在当代中国电影研究面前的重要问题。

面对这些充满矛盾的问题，中国电影理论界和创作界也在持续进行关注，国内主要从事专业电影研究的学术期刊以及其他商业性的电影杂志、文化期刊都曾先后组织了关于中国电影问题的专题讨论和议题。其中，《当代电影》《电影艺术》《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等专业学术期刊，先后就中国式大片与主流电影、中国电影与文化软实力、数字媒介时代的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产业化、中国电影类型化、中国电影贺岁片与档期等议题组织了多篇专题研究论文以及相关讨论。《看电影》《电影世界》和《三联生活周刊》等商业性的电影和文化杂志也以“电影大批判”“零零年代电影报告”和“一亿太少”等专题回顾与专题讨论的形式组织过对相关问题的讨论。从这些描述性、总结性和研究性的文章和讨论的情况来看，虽然提供了不少具体的事例，但大多是就事论事、就电影论电影，并没有出离电影文本或行业外来看待这些问题。虽然，这样讨论问题比较有针对性，更细致、更具体，但是，

由于只有“入乎其内”的态度，而缺乏“出乎其外”的视角，因此，对新世纪中国电影现状的分析往往容易囿于现象本身，流于表面，对问题的解决方略也容易带上脱离整体文化语境和社会现实的理想化色彩。

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中国电影的研究出现了文化研究的转向。^①对中国电影的研究也从单纯依托电影文本，从中发掘电影的文化属性中解脱出来，不再将电影作为独立自主的文本来看待，而是将电影放在一个具体的文化语境中，从管理、制作、传播和接受的整体过程来考察，更多地看到电影与社会文化之间从属与互动的关系。这为解读中国电影的诸多现象和问题提供了另一种视角，有助于更为深入地透析现象和本质的本质。

自法兰克福学派将电影作为文化工业加以批判，开了电影文化研究的先河以后，英国的伯明翰学派也相继将影视媒介纳入文化研究的视域，影视媒介作为文化研究的重点对象和参照文本日益突出。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大卫·波德维尔的《电影诗学》、罗伯特·考克尔的《电影的形式与文化》和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格雷姆·特纳的《电影作为社会实践》、马克·费罗的《电影和历史》等都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

我国采用文化研究的方式进行电影研究的著作、论文为数不少。陈旭光的《电影文化之维》是较早的有意识地从整体文化语境对国内电影文化现象进行研究的专著，由于写作时间的缘故，该书主要针对的是新世纪之前的电影文化现象，而对新世纪之后中国电影产业化的新变鲜有涉及。新世纪以后，国内采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对中国电影史、当代电影进行研究的相关著作和理论文章逐渐增多。其中针对中国电影进行研究的主要著作有：张颐武的《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探讨了中国电影发展和全球化的关系，并对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等中国著名导演进行了个案分析；蓝爱国、马薇薇的《文化遗产与文化消费——电影产业的文化道路》针对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历史与现实所呈现出来的产业文化格局、产业文化经验、产业文化特征、产业文化认知和产业文化困境，以文化理论为研究框架展开了富有针对性的分析与阐述；俞剑红的《中国电影企业运营模式研究》从早期中国电影企业的

^① 相关论述可参见李道新《中国电影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三部分“中国电影的文化批评时期”的有关论述。

历史研究入手，对国内外当代电影产业和企业进行比较研究，对当代中国电影企业的经营管理、战略选择、发展态势以及未来趋势做了全方位的分析和研究；饶曙光的《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史》在对中国电影市场历时发展进行细致论述的基础上，对新世纪中国电影市场、产业等问题和现象也进行了论述；余纪的《区县电影市场田野调查》以来自重庆地区的电影产业现状、区县电影公司现状、惠民工程实施情况、区县影院生存现状等实地调研的一手材料为依据，以点带面地展开对区县电影市场的实证研究；李道新的《中国电影文化史（1905—2004）》也是一部重要的中国电影文化史著作，该书结合中国现代文化不同时期的文化语境论述中国电影生存和发展的具体状况，显示出了电影文化研究宏大的视角，其中对新世纪中国电影也有涉及。另外，每年年初的《当代电影》《电影艺术》《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等电影专业学术期刊也会刊登上年度电影产业、艺术和理论研究的回顾、总结性的文章；中国电影出版社每年都会出版年度中国电影产业报告、艺术报告以及电影年鉴等，汇集了有关新世纪中国电影文化研究所需的资料和有关研究中国电影文化现象的重要成果。

在论文方面，电影产业、市场、政策法规等内容也是构成电影文化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这方面中国电影的专业研究刊物多次组织了有关问题和现象的专题讨论，主要有2006年《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第4期组织的“华语大片现象研究”中戴德刚的《从传播学角度审视华语大片现象》、刘小磊的《华语大片与受众信用策略》等，2009年《当代电影》第1期的“中小成本电影的市场出路”、第3期的“贺岁档：中国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第4期的“机遇还是挑战：金融危机与中国电影”、第8期的“中国电影版权的保护和利用”、第9期的“中影集团创作格局及产业发展”等专题，2009年《电影艺术》第5期的“中国电影产业集群研究”等。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的“中国电影论坛”连续数届关注电影产业与市场。中国电影论坛丛书系列继2002年的《中国电影：创作与市场——第十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之后，2004年又推出了《影视产业与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第十二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3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中国电影论坛”则把“中国民营影视企业现状与发展”作为中心论题，其论文结集为《中国民营影视企业现状与发展——第十三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于2005年出版。《当代电影》继2008年第2期的“文化软实力与

中国电影”专题之后，于2009年第2期推出“国家形象与中国电影”专题，通过倪震的《我们将为世界银幕生产什么？——再论中国电影和国家形象》，饶曙光的《国家形象与电影的文化自觉》，王一川的《国家硬形象、软形象及其交融态——兼谈中国电影的影像政治修辞》，尹鸿、石惠敏的《中国电影与国家“软形象”》等文章探讨如何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如何通过文化，尤其是电影来塑造和树立国家形象。有关电影创制方面，2006年第5期《当代电影》“影视现象观察”栏目对第六代导演进行了特别关注，《电影艺术》2006年设立的专栏“中国电影新势力”对青年导演的创作进行了关注，先后刊发了对多位中国青年电影导演，特别是独立制片导演的访谈和分析文章，如谭秋文的《电影工业从青年开始——第一届华语青年影像论坛综述》、于冬的《小成本电影的市场出路》、焦雄屏的《产业架构与中低成本电影》、陈墨的《青年与电影的多种可能性》、黄式宪的《东方的诗意及其文化多样性——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的文化启示》等，这些论文从不同角度解读了中国电影新生代的发展和前景。另外，散见于电影类期刊、文化类期刊、书籍中有关当代中国电影导演、制片和其他电影从业人员访谈、研究的文章和著作也从不同方面对新世纪中国电影进行了持续的关注。

博士论文方面，近年来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新时期、新世纪中国电影进行研究也成为文艺学、文学和电影研究生关注的热点，其中，山东师范大学宋彦2009年的博士论文《穿行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新时期中国电影文化勘探》运用现代和后现代理论，从中国新时期以来电影文本的内容出发，分析其中所具有的现代和后现代的文化特征。上海大学万传法2009年的博士论文《当代中国电影的工业和美学1978—2008》主要从中国新时期以来电影工业的发展变化来看待其与中国当代电影美学风格的关系。

就目前来看，采用文化研究的方式，对当代中国电影的管控、创制、传播、接受方面进行研究的成果已经相当丰富。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就事论事层面，缺乏一个全局性的文化视角，即将新世纪的中国电影放在中国文化的总体格局中来加以考察，表现出中国文化和中国电影互为表里的关系以及新世纪中国电影文化的特殊性。因此，这些研究往往流于现象的表层，虽然材料丰富、论述精辟，但却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当代中国电影在文化上的根本症结。

从文化研究来看，社会文化不是由单一的文化力量所宰制的，而是多种文化力